

赤练蛇文丛
Chilianshe Wencong

当代
文坛
酷评
四家

我们反对油滑等于向作家要求深刻，否定冷漠等于向作家要求公正，是的，公正，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因为，没有公正，就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就没有平等，就没有尊严。

李建军·著

大象，
是甲虫
——莫言及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析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赤练蛇文丛
Chilianshe Wencong

当代
文坛
酷评
四家

是大象， 还是甲虫

——莫言及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析疑

李建军·著

我们反对油滑等于向作家要求深刻，否定冷漠等于向作家要求公正，是的，公正，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因为，没有公正，就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就没有平等，就没有尊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及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析
疑/李建军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7
(赤练蛇文丛/韩石山主编)
ISBN 978-7-5378-3868-9

I. ①是…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9966号

是大象,还是甲虫

著 者:李建军

责任编辑:孙 茜

装帧设计:张永文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98(编辑办公室)

传 真:0351-5628680

网 址:<http://www.bywy.com>

E-mail: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字 数:250千字

印 张:9.25

版 次:2013年7月 第1版

印 次:2013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3868-9

定 价:32.00

文学批评：若无盛气会怎样(代序)

李建军

1

批评是一种求真的精神现象。它因真诚和真实而存在，因虚伪和虚假而没落。说真话，乃是它必须服从的律令。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首先，批评家要有敏锐的识力，要能发现被层层假象遮蔽的问题；其次，要有一股子不肯随顺的“盛气”，要有一点耻感，要把随喜说好话、顺势说假话，当做有伤尊严的失职和堕落；甚至，还要有点牺牲精神，要把被误解、受伤害，看作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文学批评的文风之好坏与境界之高下，从专业能力方面看，决定于批评家是否有成熟的判断力和表达力；从伦理精神方面看，则决定于他的气是否很盛、耻感是否很强。

从中国文论的角度来看，作文的要道，全在一个“气”字上：气盛则言宜，气衰则言乖。故自孟子首倡“养气说”以来，“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就成了中国诗学理论中的黄金定律和不易之论。唐宋两朝论文章，尤喜以“气”作比譬。刘禹锡说：“气为干，文为支，跨踈古今，鼓行乘空，附丽不以凿枘，咀嚼不以文字。”（《答柳子厚书》）而韩愈的比喻更形象，也更有名，——他将“气”喻为“水”，将“言”比做“物”，视“气”为决定写作成败的关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翱书》）逮及清代，“文气说”益昌，强调的语气，也更加斩

文学批评：若无盛气会怎样

截，类似“有气则生，无气则死”这样的话，几乎成了挂在一些学者嘴边的流口常谈。

作为一种复杂的结构，气至少由三个层面构成：一个是生理学层面，一个是心理学层面，一个是伦理学层面。其中既有先天生成的一面，也有后天养成的一面；就前者说，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就后者说，它又具有可重构的变易性。虽然就其最初形态来看，气无非是“鼻息出入之气”，但是，通过积极的修养，这种自然形态的“生理之气”，可以逐渐升华为精神形态的“心理之气”与更高意义上的“伦理之气”：“理气此气，血气亦此气，圣贤庸众皆此气，辨在养不养耳”（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上册，《思篇·二十八》）。

那么，对文学批评来讲，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气”呢？

答曰：是伦理意义上的“盛气”，即充实而勃郁的浩然之气。它是真气、英气、正气、胆气的混合体，是批评家在克服了内心的顾虑和恐惧之后所获得的一种个性舒展、情绪饱满、心智活跃的状态；只有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批评家才能以一种自由的心态进行写作，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相反，如果处于气虚和气竭的状态，那么他就会因为胆怯而左顾右盼，而言不由衷地说漂亮话，而虚头八脑地说好听话。尽管，对一个批评家来讲，情、识、才、学也很重要，但相提而论，浩然之气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它的推激和支持，批评家的内心就缺乏勇气和活力，他的情、识、才、学就很难被充分地表现出来。

事实上，这种浩气甚至还应该有“怨”和“愤”的因子，即因为强烈的不满和热切的渴望，而表现出来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性诉求。在司马迁看来，“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意有所郁结”则是圣贤们著书立说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的胸膛间，也有一股沛沛然的浩气，就在于他的浩气里，流贯着敢

“怨”、敢“发愤”的精神。李卓吾在《焚书》中论及《伯夷列传》时，便肯定了这一精神，同时，他也批评了后代学者的气沮色挠，没有出息：“今学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的确，文学批评的不发达，往往不是因为批评家的气“太盛”，——所谓“盛气凌人”的批评，其实并不多见，——而是因为气太弱，弱到了近乎低首下心、低声下气、没有耻感的程度，因此，便无痛痒，无不满，无对话，无交锋。然而，浮枵不实的好听话，却是现成的，只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朋友”或有点儿名头的作家，那么，无论他写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烂作品，都有人热情而慷慨地赞美它，——他们的赞美，有时几乎到了黑白不辨、美丑不分、善恶颠倒的程度。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吕坤也说，“沾沾煦煦，柔润可人，丈夫之大耻也”。一个丧失耻感的人，大体上就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混世主义者；而批评家一旦丧失了耻感，便很有可能把说假话当做家常便饭，就有可能成为“柔润可人”的乡愿。所以，古人的耻感，我们也应该有，不可因为我们的不肖，而使先人独专斯美。然而，正是在“知耻”一事上，我们却有违祖训，显得很不成器。

2

却说，最近，我有幸阅读了一部涉及五代之乱与宋辽之争的名为《西夏咒》的当代小说。在这部小说的“后记”里，作者自称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和觉悟：“时下的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因而，为了远离贪嗔痴“三毒”，他已经“全身心地进入了宗教”，然而，他所信奉的宗教——一种我闻所未闻且名称很怪的“宗教”——不仅没有帮他变得更加智慧和成熟，反而使他连最基本的事实感和判断力都丧失了。这部作品的“反小说”的叙事和粗糙的语言所造成的阅读障碍，已经很折磨人了，然而，更让人惊诧和难以接受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它的历史观和宗教思

文学批评：若无盛气会怎样

想，——它对民族英雄的贬损，对觊觎事故者的赞美，实在是太出格、太离谱了。

“五代”之际，中国进入了政局最为纷乱的时期，也进入了世风浇漓、士节最差的时期，正像蔡东藩所说的那样：“‘甚矣哉！中国之乱，未有逾于五季者也！’天地闭，贤人隐，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铤而走险，虽夷虏犹尊亲也，急则生变，虽骨肉犹仇敌也。元首如弈棋，国家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斗尚无已时。”（《五代演义·自序》）正因为关怀世道人心，正因为看到了砥砺士节、匡救世风的迫切性，陈寅恪先生才在《赠蒋秉南序》中，高度评价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欧阳永叔学韩昌黎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然而，我们时代的这位对“西夏”文化情有独钟的小说家，却偏要跟欧阳修唱反调，立志要给冯道和秦桧这样的无特操、没骨气的人翻案。在他看来，面对异族的侵袭，反抗便是灾难和罪恶，而妥协才是出路和功德；所以，抵抗外侮的岳飞、陆游和文天祥就是罪人，而敢于投降的秦桧、冯道和洪承畴则是英雄，是被人们长期误解和冤枉、因而需要重新评价的救命菩萨。然而，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由人团捏的软泥巴，对那些是非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那些忠奸已经有定评的历史人物，后来的人们固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他的立场和观点多么具有“现代性”和“宗教感”，都不能丧失最基本的历史感，都不能颠覆那些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

就拿冯道来说，他“历四朝，相六帝”（《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无论站在旧道德的立场来审视，还是用新道德的尺度来衡量，问题都是很严重的。在司马光眼里，他“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毫无气节和人格可言；在欧阳修笔下，他“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沾沾然以“长乐老”自命，实“可谓无廉耻者矣”（《新五代史》

卷五十四)，是只配归入“杂传”的。然而，在我们时代的这位小说家的叙事里，他却是“世间法意义上的‘菩萨’”：“在一次次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中，冯道用智慧和幽默，为百姓拒绝了指手画脚的一把把屠刀，真正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了。”鲁迅“怒其不争”的反讽，被生吞活剥地转换成了冠冕堂皇的“正言”：摧刚为柔，扭直作曲的功夫真是了得！

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在这位作者的笔下，文天祥陷阵却敌、不避汤火的英雄行为，不仅无功，而且有罪：“在所谓的‘汗青’中，耀武扬威的，恰恰是帮凶和罪人。”总而言之，“所谓的‘民族大义’，其实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部落对同类举起屠刀时理直气壮的嚎叫。……千年来的文人们讴歌的，便是这个了”。在这部神道设教、故弄玄虚的作品里，“宗教”被当做旗帜举起来，尊严却被当做泥土踩在脚下，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全然没有了意义，——只要能活命就够了，管他天下是谁家的天下。

本来，严肃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严格的尺度和严谨的态度，要对作家的不成熟的创作和不可靠的思想，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对话性的质疑，从而向社会提供负责任的判断和有价值的“批判性话语”。然而，让人困惑和失望的是，面对这样一部忠奸不辨、厚诬古人的小说，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却不仅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质疑精神，反而在发言和文章里，说了一大堆不着边际、文过饰非的好听话，竟然认为这位作家的“文学成就”被低估了，竟然认为他已经进入为数不多的“大作家”的行列了，全然没有正常的文学批评所应该有的“盛气”——面对问题直言无讳的正气和胆气。

3

是的，在那些热诚的批评家的内心，总有一股不可遏抑的盛气。当然，“气盛”不是为了“凌人”，而是为了“立言”，为了维

持真理和批评的尊严，使它不至于堕到尘埃里。批评是与自尊和良知密切相关的事业，而正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判断，则是批评必须服从的道德律令。

几乎所有优秀的批评家，都是敢说真话的人。他们也许显得尖锐、冷峻，但却毫无恶意。他们不怕得罪人，也很少考虑因为批评自己会失去什么样的利益。在对待批评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纯粹的学术态度和高尚的专业精神。李长之对鲁迅的批评，常风对《子夜》的批评，李健吾对巴金《爱情三部曲》的批评，傅雷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连环套》的批评，苏雪林对沈从文小说种种缺点的批评，朱自清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龙应台对无名氏与王赓和小说的批评，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值得称道的典范。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常风先生对《子夜》的坦率批评。要知道，自1933年6月出版之后，茅盾的这部作品就受到几乎众口一词的赞扬，瞿秋白甚至将这一年称作“子夜年”，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而“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然而，对这样的评价，常风先生却“不敢苟同”。1936年10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愚暗的意见”：“我们愿意坦白直率地说：这部《子夜》是一个失败，一个大失败。……就《子夜》的中心人物吴荪甫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无灵魂的木偶。这是一个多种人格的混合物，但是在叙述中似乎缺少若干必要的说明。像傀儡戏中的木头人一样，吴荪甫是一个被劣等的玩傀儡戏者在摆动着。这部伟著的开始就是一个不幸的征兆。描写吴老太爷和那位跟随他从乡下来到上海的小姐过分的闹剧化，讽刺的堕于恶趣。作者布置了那样广阔的场面，海错山珍，无美不臻，但是他却明显地表示出他需要更大的魄力——关于处理题材和描写——与更深刻的观察力——关于抉择和认识题材。《子夜》是一个失败——一个惨痛的失败，那样丰富的一席盛宴。”倘若放在今天，这样的直

言无隐的批评，肯定要被我们时代忠厚之态可掬的人们，归入“酷评”之列的。然而，关于《子夜》，常风先生提供给我们的，却是最有事实感和问题意识的观点，也是最值得珍惜的意见。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如果没有那股“盛气”，常风先生断然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那一通几乎要犯众怒的议论来。

伟大的别林斯基，——他的名字几乎可以被当做“批评家”的代名词，——也是这样一位“气”很“盛”的批评家。他真诚地肯定过许多作家的成就，但也批评过不少作家的问题，即使对自己曾经欣赏和赞扬过的果戈理，一旦发现他后来的创作出了问题，他也照样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事实上，这种充满激情的批评精神，在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也是特别需要的。不少有成就有影响的研究文学的学者，同时也是优秀的批评家，而他们的著作里，也都充满批评的激情和“盛气”。例如，在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在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在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在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中，在马克·斯洛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甚至在布鲁姆的值得商榷的《西方的正典》中，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批评精神的存在，也能感受到一股“盛气”的存在。

4

在广受欢迎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里，勃兰兑斯这样评价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不像歌德那样是一个平静的人。在他的摇篮的上方闪耀着不祥的星；他和拿破仑是同年生的，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的残酷黯淡的特征在他的作品里是有明显的反映的，给了他们一种狂野的品质。”这样的文字，优美而深刻，一针见血，充满“盛气”，——这股气，他在评价海涅、贡斯当、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乔治·桑、缪塞、圣伯甫等人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勃兰兑斯的批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批评的文风不仅是一个语言和形式的问题，还是一个与批评家的精神状况密切相关的问题；文体问题其实就是文气问题，而文气则与心气相通，是作者的个性、气质、人格和德性的外在表现。《易经·系辞下篇》里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是一段极为深刻的话。它说明，文风的形成和差异，其实就决定于批评家的性格特点和人格状况，甚至决定于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伦理行为和道德体验。所以，仅仅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角度，从技巧和形式的角度，根本无法完整而全面地揭示文风形成的原因。

勃兰兑斯在谈及法国“浪漫派”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长也很精彩的话。他说，作家若是看着公众的脸色行事，为了赢得自己时代人们的赏识而写作，那么，即使他赢得了桂冠和财富，他也是不存在的，他的作品也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只有当他“没有任何思想顾虑，道出了他的亲身感受，写出了他的亲眼所见的每一部这样的作品，不管它的刊印的版本多么稀少，却是一部有价值的文献，而且将永远是有价值的文献。”

其实，对文学批评家，也可作如是观。打油诗云：文章所贵在风骨，最是盛气不可无。史公昂首敌万岁，鲁迅横眉对千夫。若非一士能谔谔，哪得百姓破铁屋。可怜后来诸公者，唯习拍马屠龙术。对文学批评来讲，所谓“盛气”，是含着“气节”和“正义感”的意思在里头的，与“耻感”是相通的。一个好的批评家，只有当他行己有耻、不仰人鼻息的时候，只有当他敢于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想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批评文章，他的文体才有可能活泼的、热情的、有个性的，才能最终达到韩愈所说的那种“气盛言宜”的境界。

2011年5月12日，北新桥

目 录

文学批评:若无盛气会怎样(代序)李建军/1

“彻底失败的作品”?

——应该怎样评价《随想录》/1

一个问题,两个答案

——关于王蒙的鲁迅观/10

不应该这样写

——评《王蒙自传》/21

是大象,还是甲虫?

——评《檀香刑》/33

《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

——论《蛙》/54

拧巴而饶舌的热媒介叙事

——刘震云及其《手机》批判/69

一些结得很坏的果子

- 评《一腔废话》/ 78
- 那些优雅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 评《废都》/ 81
- 被琐事压倒的叙事
- 论《秦腔》的细节分离化描写及其他 / 124
- 茹志鹃抄袭孙犁了吗？
- 为《百合花》辩护 / 144
- 路遥没有才华吗？
- 论路遥文学才情的特点 / 160
- 求真高于行善吗？
- 论王小波对菲尔丁的误读 / 165
- 要把真经度与人
- 从余华作品看北京“实验教科书”的问题 / 173
- 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
- 评《尘埃落定》/ 187
- 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
- 评《看麦娘》/ 215
- 为拜金时代制定丛林法则
- 评《狼图腾》/ 231
- 怎可如此颂秦皇
- 从《大秦帝国》看当下历史叙事的危机 / 257
- 作家享有批评豁免权吗？(代跋) / 280

“彻底失败的作品”？

——应该怎样评价《随想录》

巴金的《随想录》记录了一个老人的经历和思考，内蕴着他的悲伤和眼泪，包含着他的忧虑和希望。它既不是“红宝书”，也不是“白皮书”；里面没有“生意经”，也没有“升官图”。它是一个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一笔一笔地写给所有中国人的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书。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巴金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痛定思痛，写出了一大批朴实、深刻的杂文和随笔。这些收入《随想录》的文章抒真情、说真话、破愚蒙、启民智，标志着巴金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登上了又一个辉煌的高峰。袁鹰高度评价巴金的“忧心殷殷”的写作：“五本《随想录》，不仅是巴金悠长的文学道路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有的评论家称誉它为当代散文的巅峰之作，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这部巨著，标志着我们时代最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充满了作家对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的思考的光

辉，完全可以同鲁迅先生的杂文相媲美。”^①比较起来，巴金的《随想录》也许不如鲁迅的杂文那样尖锐、沉雄，但是却像它一样真诚，一样热情。

《随想录》^②是一首悼亡的安魂曲。“文革”期间，巴金虽然九死一生，侥幸地活了下来，但是，他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却一个个被迫害致死，尤其是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萧珊，刚刚51岁，便因为恐怖和绝望资志而歿。朋友和亲人的死，给性格内向、天性敏感的巴金带来巨大的痛苦。“情往会悲，文来引泣”（《文心雕龙·哀吊》），巴金的《怀念萧珊》《纪念雪峰》《悼方之同志》《怀念老舍同志》《赵丹同志》《再忆萧珊》等文章如泣如诉，情深意长，曾经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随想录》是一部勇于自省的忏悔录。自我怀疑和自我反思是新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鲁迅说他固然时时解剖别人，但也更严格地解剖自己。像鲁迅一样，巴金也勇于“严格地解剖自己”——他没有仅仅把自己当做受害者，而是把自己当做被审视的对象，当做潜在的甚至事实上的“合谋者”。他说：“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登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害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解剖自己》）这段话，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非常深刻，深刻得令人“毛骨悚然”：在一个诱使人犯罪的极端可怕的环境

①《《随想录》的启示》，《随笔》1988年第1期。

②巴金：《随想录》（全本），作家出版社，2005年。下引此书，只在引文后注明篇目。

里，个人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自觉，实在太脆弱，实在太无力。所以，重要的，仍然是改变环境，完善制度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把人从不安全的危境里解放出来，才能使人避免陷入从犯罪的无奈境地。

《随想录》更是一部“述往事，思来者”的忧患之作。作为中华民族千年未有之“变局”，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不仅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和道德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受到了冲击，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百姓，都付出了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以传承文化为职志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更是首当其冲，受尽折磨，被迫说不想说的话，被迫做不愿做的事。他们被当做“牛鬼蛇神”，关押进“牛棚”，被遣送到“干校”和“劳改农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和伤害，留下了极为严重的后遗症。巴金说：“我至今心有余悸，只能说明我不坚强，或者我很软弱。但是十年间我究竟见过多少坚强的人？经过接连不断大大小小的运动之后，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点锋芒都给磨光了。有人‘画地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圈，仿佛我们还生活在周文王的时代。”（《纪念》）像其他许多优秀的作家一样，巴金也被当做罪大恶极的“犯人”，有人甚至对他说：“根据你的罪行，判你十个死刑也不多。”（《“友谊的海洋”》）他受尽了侮辱，曾经被迫跪在“领袖像”前“请罪”。他认真地改造自己，但是，无论他怎么努力，仍然无法成为“好人”。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写文章吗？”（《究竟属于谁？》）尽管如此，巴金并没有喋喋不休地述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在他看来，“文革”不只是哪一个人的灾难，也不只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它不仅同中华民族有关系，而且同世界人民有关系，所以，他

说：“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做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有人会写出新的《神曲》。”（《说真话》）

《随想录》的核心主题就是反思并揭示“文革”的封建主义性质；它的锋芒所向，就是反专制，反愚昧，反对压抑人性、践踏人类尊严的昏暴。正像陈丹晨所指出的那样：巴金“鞭挞‘四人帮’、批判封建专制、反对现代迷信。……他对于那种强加于人、愚弄人民、搞蒙昧主义、人云亦云等等思想僵化、封建专制的做法特别反感。”^①巴金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精神传统。他反复强调“五四”对自己的影响：“我说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为“五四”辩护，赞美“五四”的青春激情，提醒人们警惕精神的“老化”：“‘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五四’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达到。但这绝不是‘五四’的错。想不到今天我们之间还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几千年的垃圾当做基石，在上面建造楼台、宝塔。他们四处寻根，还想用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准则‘行事、做人’。”（《老化》）巴金对“文革”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态度：“在十载‘文革’中我看够了兽性的大发作，我不能不经常思考造反派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我深受其害，有权控诉，也有权探索，因为‘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今天还在蚕食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不过是怕见这种超级大马戏的重演，换句话说，我不愿意再进‘牛棚’。”（《人道主义》）

那么，“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人是怎么变成“兽”的？人们的心上留下了怎么样的伤痕？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谁应该为这一切负责？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和灾难再

^①陈丹晨：《战士的性格——从〈烽火集〉到〈随想录〉》，《读书》1981年第6期。